

关于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几个问题

王飞峰

(高丽大学韩国环境考古研究所)

摘要: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作为高句丽国内城时期的三座王陵,三陵相对应的墓主人分别是故国壤王、好太王和长寿王。太王陵铭文铜铃是好太王即位当年(391年)制作的器物,不仅具有纪念意义,而且可能还是好太王在世时的实用器(如马具),好太王死后作为随葬品陪葬太王陵,铭文中“大”字存在漏刻“、”的现象。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好太王时期,并且在好太王时期一出现就产生了许多类型。将军坟为长寿王迁都以前修建的陵墓,迁都平壤以后长寿王葬于平壤,将军坟为“虚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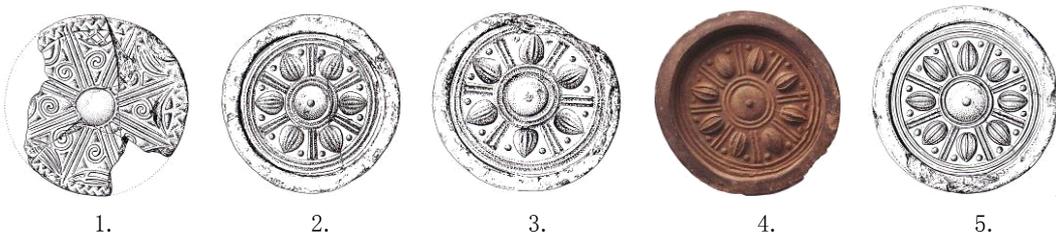
关键词: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莲花纹瓦当

1990年—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集安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集安地区的高句丽王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及发掘,随后出版了《集安高句丽王陵》的报告书^[1],书中根据调查发掘成果总结出高句丽王陵的一些主要特征,并对一些王陵与高句丽王的对应问题提出了目前中国学界的看法。其中较多篇幅介绍了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出土遗物及三陵对应的墓主人:千秋墓墓主人为高句丽第十八代王故国壤王(384—391,在位时间,以下略),太王陵墓主人为第十九代王好太王(391—412),将军坟墓主人为第二十代王长寿王(412—491)。但是日韩学界和中国学界部分学者对三陵前后顺序及墓主人的认定与报告书仍有一定差异,笔者通过对三陵资料及相关论文等的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三陵先后序列的确认

《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书已经从三陵出土遗物、墓葬结构、墓葬形制与同一时期高句丽王的对应等诸多方面论证了三陵的墓主人和先后序列。笔者在同意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莲花纹瓦当的发展演变和三陵的大小两方面再次论证三陵的先后关系。

目前集安地区经过调查发掘认为是高句丽的王陵中,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均有莲花纹瓦当出土^[2]。千秋墓莲花纹瓦当为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太王陵不仅有与千秋墓相似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而且还出现了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将军坟的莲花纹瓦当则全部是与太王陵相似的八瓣莲花纹瓦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千秋墓还出土了卷云纹瓦当,卷云纹瓦当具有八个分区,各区之间的界格线为三条,界格线的一端连接当心的乳钉、另一端则直接在边轮上等特点(图一:1),这些特点表明千秋墓出土卷云纹瓦当已经是高句丽卷云纹瓦当的最晚形态。因此千秋墓也成为高句丽王陵中具有分界线性质的墓葬,即千秋墓是高句丽卷云纹瓦当消失、莲花纹瓦当出现的标志性墓葬;国内城时期集安地区莲花纹瓦当演变的特点之一是:同类型瓦当莲瓣的数量越来越多^[3],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同类型瓦当也表现出六瓣至八瓣的变化(图一:2—5);而且就莲花纹瓦当的大小而言,千秋墓莲花纹瓦当的直径为15.6—16.6厘米,太王陵莲花纹瓦当直径为16—21.6厘米,将军坟莲花纹瓦当直径为16以上^[4]—22厘米,莲花纹瓦当在形态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就从莲花纹瓦当的序列上确认了三陵前后相继的关系,即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



图一 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出土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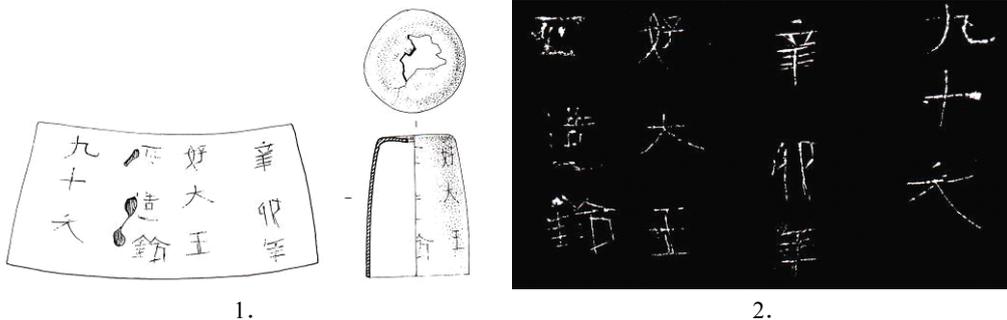
1. 千秋墓卷云纹瓦当
2. 千秋墓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
3. 太王陵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
4. 太王陵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
5. 将军坟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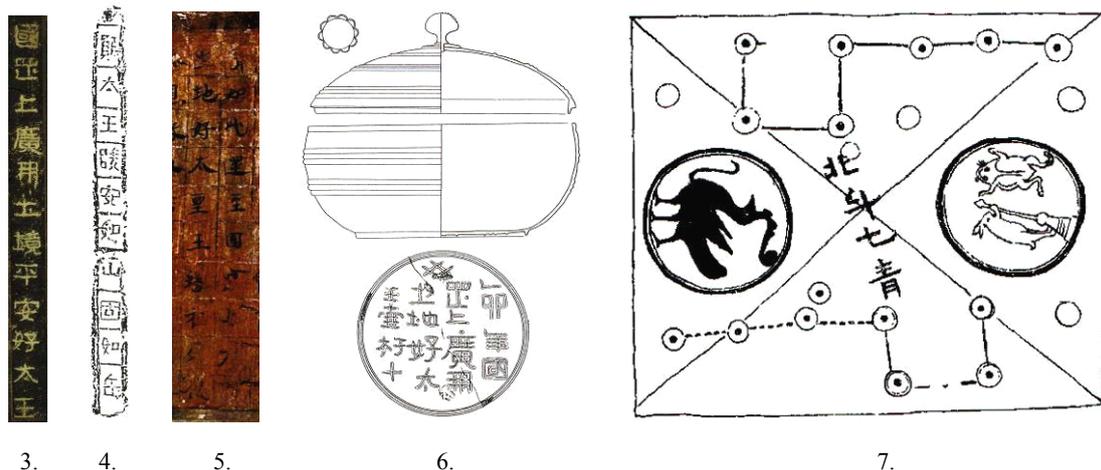
在墓葬形制上三陵均为方坛阶梯石室墓，已经是高句丽积石墓的晚期形态，从墓葬形制上判定三陵的序列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却发现三陵在大小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千秋墓的边长约 63 米，太王陵约 62 米，将军坟约 32 米^[5]，三陵表现出边长越来越小的趋势。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基于墓葬结构的考虑，如此形态巨大的陵墓，仅仅依靠十几块“护坟石”来希望“千秋万岁永固”似乎难以做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形态上有所减小，同时在墓葬外表采取一些有利于固定墓葬的措施（如将军坟的条石边缘即有防止条石滑动的凸棱^[6]）；另一方面三陵在时代上处于高句丽国内城时期的最后阶段，积石墓王陵的形制已经几近完善，其中后继者在为自己修建墓葬时，往往首先要面对的是先王的陵墓，墓葬形态的大小往往隐含着对先王乃至自己功绩的评定，减小自己墓葬的形态则表明了对先王业绩的褒扬而对自己一生的含蓄肯定。因此从墓葬形态上也间接确认了三陵的序列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千秋墓和太王陵墓葬结构已经失去原来面貌，目前的统计数据是：千秋墓东边长约 67 米，南边长约 60.5 米，西边长约 62.6 米，北边长约 71 米，复原边长约 63 米；东高 7.9 米，南高 10.8 米，西高 10.9 米，北高 8.6 米，残存 5 级阶坛，墓室完全被毁，墓葬残高约 11 米。太王陵东边长 62.5 米，南边长 63 米，西边长 66 米，北边长 68 米，复原边约为 62 米；8 级阶坛保存完好，墓室保存完整，墓葬存高 14 米，其中墓室高 3 米，上有约 1 米的封土。将军坟基坛平均边长 32.3 米，7 级阶坛保存完整，墓葬高度 13.07 米，其中墓室高度 5.1 米。笔者认为好太王作为集安时期在文治武功方面功绩卓绝的高句丽王，在面对先王的千秋墓时，只要在墓葬形态上没有超过千秋墓即是对自己陵墓的缩小，虽然这一时期积石墓的石室表现出由低矮向高大发展的趋势^[7]，但是根据太王陵和将军坟墓室高度及三陵现存阶坛数与墓葬高度的比值，那么千秋墓高度复原数据应大于太王陵，说明太王陵在形态上确实小于千秋墓。

二、太王陵铜铃铭文

在太王陵出土的随葬品中多位研究者都曾提及铭文铜铃并对铭文（图二：1）的含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第七字不太清晰，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8]。原报告电镜扫描铭文为：“辛卯年好大王口造铃九十六”^[9]（图二：2），在目前尚无其他对应的铭文铜铃或器物





图二 好太王铭文铜铃及相关遗物

- 1.好太王铜铃铭文摹写图 2.好太王铜铃铭文电镜扫描图 3.好太王碑“國罌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拓
4.太王陵铭文砖“願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拓本 5.冉牟墓墓志“國罌上廣開土地好太聖王”
6.新罗壶杆塚铜壶杆铭文“乙卯年國罌上廣開土地好太王壺杆十” 7.长川一号墓藻井“北斗七青”壁画

出土的情况下，对于第七字的各种释读只能看做推测而已，而且对判定太王陵墓主人实际上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反笔者认为关于第五字“大”的释读则更为重要。

好太王碑自名墓主人为“國罌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图二：3）”，因此国内学者多称其为好太王，日韩学者多称为广开土王或广开土大王。关于好太王的王号好太王碑的的写法有四种，分别是“國罌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第一面第四行），“國罌上廣開土境好太王”（第四面第五行和第四面第八行），“永樂太王”（第一面第五行），“太王”（第二面第四行和第二面第七行）。而在碑体上我们发现这些所有与“太王”相关的称谓在刻写时均为“太”，并没有出现“大”。太王陵附近发现的铭文砖上有“願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10]（图二：4）；冉牟墓墓志写作“國罌上廣開土地好太聖王”（第44行至45行^[11]）（图二：5）；中原郡高句丽碑开篇即为“五月中我太王祖王”^[12]；新罗壶杆塚出土的铜壶杆有“乙卯年國罌上廣開土地好太王壺杆十”十六字铭文^[13]（图二：6）；瑞凤塚出土的銀合（盒）杆盖内有：“延壽元年歲在卯三月中，太王教（或释为“敬”）造合杆用三斤六兩”，外底有：“延壽元年歲在辛三月中，太王教（或释为“敬”）造合杆用三斤六兩”。这些铭文中称“好太王”时“王”与“太”一起组合使用，并没有出现“王”与“大”一起连用的现象。

太王陵铜铃铭文是篆刻而成的，由于是使用利器在铜器上刻字，往往一次性刻好相对比较困难。而且笔者认为当时高句丽地区制造器物或者描摹壁画的工匠可能身份比较低微，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文化水平可能也不一定是很高，长川一号墓后室藻井上的“北斗七青”^[14]（图二：7）即为例证。因此在铜铃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多刻少刻甚至刻错的可能性，铜铃上除“大”字、“九”字、“十”字外其他各字刻写时均有明显出入，其中本有三横的“辛”字更是有六横之多。鉴于目前确认的与好太王相关的遗物在称其为“王”时均与“太”相连，而且太王碑铭文中也有“好太王”的称谓，太王陵出土铜铃铭文却为“好大王”，因此笔者认为此处铭文应为当时工匠漏刻“、”而造成的，即原铭文为“辛卯年好太王口造鈴九十六”。

“九十六”三字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是太王陵随葬品总编号的第九十六号，有学者也认为是好太王时期制造此类铜铃第九十六个的编号。^[15]但就“乙卯年國罌上廣開土地好太王壺杆十”的铭文来看，似乎后者比较合理。由于目前发现的此类铭文器物数量较少，因此关于“九十六”的解释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铜铃的制造年代，我们可以认定是好太王时期的遗物，好太王在位的年代为391至412

年，期间的“辛卯年”仅有好太王元年（391），表明此件铜铃是391年好太王刚刚即位时制作的。至于其作用笔者认为作为新王即位之初制作的器物，一方面可能具有新王登基纪念之意，一方面其准确的纪年也表明了王位更替的年代，此外可能还是实用的器物（如马具等）。伴随着好太王的故去，作为好太王的日常用品——铜铃也作为陪葬品而出现在太王陵上^[16]。就“太王”或“好太王”的称号而言，笔者认为并不属于谥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原郡碑上得到提示，罗云“太子”的部属在立碑时，依祖孙关系将长寿王称为“祖王”，那么与“祖王”一起出现的“太王”称谓也不应当是谥号，如同今天我们可以称自己在世的祖父为“爷爷”，太祖父为“太爷”一样。同样好太王碑（第一面第五行）在叙述好太王生平时有：“二九登祚，号爲永樂太王”，那么这里出现的“永樂太王”或“太王”是对刚刚即位的好太王的称谓，显然不是谥号。

而且就“大王”的称号而言，高句丽诸王仅有第六代王太祖大王（53—146）、第七代王次大王（146—165）和第八代王新大王（165—179）的称号与“大王”相关，但是无论从太王陵的墓葬形制还是从出土遗物判断，太王陵与以上三王均没有关系。日本学者武田幸男认为高句丽“太王”的称号可能始于故国原王时期，故国壤王时期已经出现，好太王时期得到确立，长寿王时期进一步认可。^[17]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在目前材料下尚无法证明其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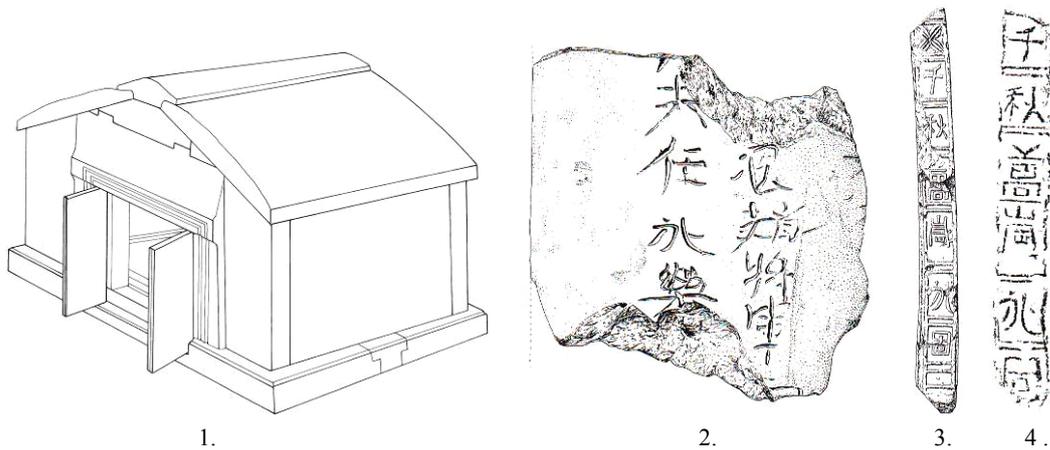
通过太王陵铜铃铭文及对好太王称谓等的分析，笔者认为太王陵墓主人为好太王。作为前后相继的三座王陵，笔者同样也认为千秋墓为故国壤王的陵墓，将军坟墓为长寿王的陵墓。

三、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

关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说法。丸都山城宫殿区曾出土大量莲花纹、忍冬纹和兽面纹瓦当，报告书将宫殿遗址的下限定为342年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之时^[18]，说明发掘者认为342年之前高句丽已经有莲花纹、忍冬纹和兽面纹瓦当。笔者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和忍冬纹瓦当此类具有明显佛教含义的瓦当应产生于佛教传入高句丽之后（372年^[19]）。关于357年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装饰，笔者认为只是冬寿及当时的高句丽人对于这种纹样的认可，并不能代表当时高句丽地区已经有了佛教的传入，结合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壁画年代及丸都山城宫殿区出土陶器等，笔者认为丸都山城宫殿址的年代上限为372年、427年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20]。国内城东台子遗址出土的瓦当类型与纹样和丸都山城宫殿区出土的瓦当较为相似，方起东先生认为此处遗址可能是故国壤王九年（392年）修建的高句丽社稷和宗庙^[21]，因此东台子遗址也成为目前国内城时期年代和性质较为确定的一处重要的高句丽建筑。

那么千秋墓上的莲花纹瓦当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好太王碑（第四面第七行第八行）有：“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唯国罍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22]说明好太王时期曾经为先王立碑，其中也包括对“陵寝建筑”的修缮，千秋墓出土的“永樂”铭文的筒瓦正是好太王为先王修陵烧造的，那么千秋墓上出现的与太王陵相似的六瓣莲花纹瓦当可能也是好太王修陵的产物。

1990年在清理太王陵墓室时出土了太王陵石椁（图三：1），在目前已经确认的是王陵的墓葬中，千秋墓和太王陵是仅有的两座有石椁的墓葬，同时也是仅有铭文砖的两座墓葬，并且千秋墓Ac和Ae型铭文砖（图三：3—4）的“永”与“永樂”铭文筒瓦（图三：2）的“永”字也较为相似。相似的六瓣莲花纹瓦当、石椁及铭文砖等重要遗物和墓葬制度方面的高度相似性不仅表明了千秋墓及太王陵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就莲花纹瓦当的演变来看笔者认为二陵墓主人是前后相继的高句丽王。那么石椁和铭文砖可能也是好太王在埋葬千秋墓墓主人的过程中高句丽王陵墓葬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革新。



图三 太王陵石椁及千秋墓铭文砖瓦

1.太王陵石椁 2.千秋墓“永樂”铭文筒瓦 3—4.千秋墓“千秋萬歲永固”铭文砖

东台子遗址作为故国壤王八年^[23]（391）修建的高句丽社稷和宗庙，出土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却不见有卷云纹瓦当。而故国壤王的陵墓——千秋墓上却同时出现卷云纹瓦当（最晚形态）和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故国壤王修建社稷和宗庙时并没有使用瓦当，当好太王为“先王”修陵时一并修缮了高句丽社稷和宗庙并且使用了各种瓦当。因此笔者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也是好太王时期的遗物。

至于丸都山城出土的瓦当，笔者认为其上限为372年佛教传入高句丽之时，427年迁都以后逐渐废弃。丸都山城宫殿区表土层下即为宫殿址遗存，宫殿址下直接为生土层；宫殿区地层较为简单且堆积较薄，说明使用时间可能不长；出土遗物中建筑材料瓦当、筒瓦及板瓦较多，其他生活遗物很少；《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第224页）：“十六年（406）春二月，增修宫阙”。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发掘的宫殿区可能是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之后好太王十六年重修的结果。寻找丸都山城早期宫殿址及慕容皝烧毁的宫殿址也成为国内城时期高句丽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

千秋墓上的莲花纹瓦当有没有可能是故国壤王时期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依据目前资料这种可能性还不能成立。如果千秋墓上的莲花纹瓦当是故国壤王时期的产物，那么一方面故国壤王在位的8年间既要继续沿用八个分区的卷云纹瓦当，又要开始使用千秋墓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东台子遗址和丸都山城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及兽面纹瓦当，就故国壤王时期高句丽的实际情况及瓦当的发展序列而言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好太王在为父王修葺千秋墓时，既然已经使用新烧造的“永樂”铭文筒瓦，那么也会使用好太王时期新出现的其他类型的瓦当，千秋墓上仅仅出现一种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的事实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笔者认为高句丽的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好太王时期，好太王在为先王的千秋墓修陵时开始使用了双界格的六瓣莲花纹瓦当，同时在自己营建寿陵时也使用了此类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由于好太王时期国力的空前提高，太王陵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不仅种类及数量较多，而且这一时期的瓦当在类型上同样也表现出多样性，就莲瓣数量而言有六瓣八瓣之分，就瓦当界格线而言有两条三条的区别，就莲瓣形态而言更是差异较大。关于太王陵上出现的与将军坟相似的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由于太王陵上已经出现其他类型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而将军坟上仅有这一种莲花纹瓦当，因此并不排除太王陵出土的此类瓦当也是好太王时期的产物。

四、将军坟的性质

关于将军坟的性质,目前学界同意将军坟为长寿王墓者主要有两种意见:将军坟为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回葬的陵墓,简称“回葬说”^[26];将军坟为长寿王迁都以前修建的陵墓,迁都平壤以后长寿王葬于平壤,将军坟为“虚宫”,简称“虚宫说”^[27]。“回葬说”认为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王陵依然回葬国内城地区,并将除始祖“朱蒙墓”和末王宝藏墓^[28]外的26座“王陵”在集安地区进行了比附。“虚宫说”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长寿王陵及以后诸王陵墓(宝藏王陵除外)均位于平壤城附近。

对于“回葬说”,笔者认为依据目前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还不能表明这一观点的成立。即使高句丽时期王陵存在“回葬”制度,那么结果应该是国内城时期和平壤时期王陵“回葬”桓仁境内,与“朱蒙墓”^[29]一起形成高句丽王陵区。目前集安地区存在的几座确定的王陵和平壤地区待确认的王陵都表明,高句丽时期王陵并不存在“回葬制度”。

对于“虚宫说”,笔者认为依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及目前将军坟出土的随葬品等判断,这一观点是比较合理的。427年长寿王迁都以后,依史料所记未曾见高句丽王到集安地区“巡行”等活动的记载,与之相对的是安藏王三年(521)、平原王二年(560)和荣留王二年(619)三王至“卒本祀始祖庙”^[30]。如果长寿王“回葬”集安,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诸多历史文献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似乎与事实不符。由于高句丽墓葬位于地表以上,无论是积石墓还是封土墓,地面暴露的巨大坟丘也为后世破坏者提供了便利,因此高句丽时期许多墓葬都曾被人盗扰,千秋墓、太王陵及将军坟也不例外。以笔者所见将军坟出土的随葬品与千秋墓、太王陵和其他可能为王陵的墓葬相比明显很少,并且主要是一些建筑材料,“生活用品”较少。这样的事实说明国内城时期长寿王已经开始为自己营建寿陵,陵园内的建筑中也开始放置一些器物,随着迁都平壤造陵活动随之停止,新的器物也不再放置。此外千秋墓和太王陵均发现了石椁,作为前后相继的将军坟并未发现,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将军坟的营建活动并未最终完成而长寿王也未葬于将军坟。迁都以后高句丽王陵经历了积石墓向封土墓的重大转变,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和文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高句丽王陵的石椁制度如昙花一现,平壤时期并没有继续延续下去。

五、结语

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作为国内城后期的三座王陵,其巨大的形体、种类丰富的随葬品、几近完美的墓葬结构都在吸引着每一位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的研究者。笔者通过对三陵相关资料的简单梳理,提出了目前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三陵相对应的墓主人分别是故国壤王、好太王和长寿王。太王陵铭文铜铃是好太王即位当年(391年)制作的器物,不仅具有纪念意义,同时可能还是好太王在世时的实用器(如马具),铭文中“大”字存在漏刻“丶”的现象。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好太王时期,并且在好太王时期一出现就产生了许多类型。好太王碑的第一面朝向将军坟正是表明了长寿王对先王好太王深深的怀念和功勋的铭记。将军坟为长寿王迁都以前修建的陵墓,迁都平壤以后长寿王葬于平壤,将军坟为“虚宫”。

注 释

-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以下称集安高句丽王陵[R].
- [2] 西大墓虽然也被认为可能是高句丽王陵而且也出土了莲花纹瓦当(集安高句丽王陵[R].115页图九三:6),但是由于残片较小且仅此一件,因为笔者认为后来混入的,在具体相关研究中暂不考虑。目前其他非王陵且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墓葬其时代上也晚于王陵。
- [3] 王飞峰、夏增威.高句丽丸都城瓦当研究[J].东北史地,2008(2):67~74.
- [4] 将军坟曾出土一种直径最小为16厘米的瓦当,边轮稍残,因此实际直径应该大于16厘米。见集安高句丽王陵[R].355页图二六四:2.
- [5] 本文所用三陵大小、相关遗物及其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引自原报告书。

- [6] 集安高句丽王陵[R].341 页图二五四.
- [7] 魏存成.高句丽遗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67.
- [8] 目前笔者所见第七字的释文有“峻”、“巫”、“正”、“工”和“所”五种.“峻”字见张福有、孙仁杰、迟勇.朱蒙所埋之“龙山”及太王陵铜铃“峻”字考[J].东北史地,2006(1).“巫”字见崔钟泽.集安“高句丽王陵”出土遗物的诸问题[J](韩文).韩国古代史研究,2006(3):135~168.“正”或“工”字见東潮.高句麗王陵と巨大積石塚-國內城時代の陵園制-[J].《朝鮮學報》,2006(199、120).“所”字见武田幸男.廣開土王碑との對話[M].日本:白帝社,2007.
- [9] 集安高句丽王陵[R].272 页图二〇七:4.
- [10] 此处图引自魏存成.高句丽遗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66 页图二五.
- [11] 关于冉牟墓的墨书墓志,笔者记榜题“大使者牟頭婁”为第1行,此处“國置上廣開土地好太聖王”指好太王.其中“廣”字仅剩“广”,“开”字已经漫灭.此处图引自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溝[R](卷下),東京:日滿文化協會,昭和十六年(1940):圖版九五(本文有改动).
- [12] 关于中原郡的时代及“太王”“祖王”的研究,目前学界说法不甚统一.由于碑文第一面保存较好,可以基本释读,第二面仍有部分可读,第三面和第四面碑文基本漫灭不能释读,因此也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笔者认为依据碑文所记内容及出现“太子”的称谓等,“太王”指好太王,“祖王”指长寿王,“太子”指罗云,即后来的文咨明王(492—519);立碑的时间应为长寿王时期(助多死后),立碑的人员为随从“太子”罗云巡行的部属;长寿王子助多早亡,助多子罗云“长寿王养于宫中,以为大孙”,因此罗云的部属在立碑时称罗云为“太子”,长寿王为“祖王”,好太王为“太王”比较合理.关于文咨明王资料见金富轼(原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M]卷第十九.高句丽本纪第七·文咨明王(校勘本):“文咨明王,一云明治好王,讳罗云,长寿王之孙.父王子古邹大加助多,助多早死.长寿王养于宫中,以为大孙.长寿王在位九十九年薨,继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231.本文所用《三国史记》均为此版本.
- [13] 本文用图引自李柱憲.壺杆塚·銀鈴塚出土遺物の検討[A](韩文).石軒鄭澄元教授停年紀念論叢[C].釜山:釜山考古學研究會論叢刊行委員會,2006:677~704.690 页图4:1.
- [14]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A].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员会.东北考古与历史[C].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54~173.170 页图七:2.
- [15] 武田幸男.廣開土王碑との對話[M].日本:白帝社,2007.
- [16] 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高丽传[M](3116).埋讫,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
- [17] 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M].東京:岩波書店,1989:261.
- [18] 吉林省文物考古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以下称丸都山城[R].
- [19] 三国史记[M]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221:“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注曰.李本:旧本作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
- [20] 王飞峰、夏增威.高句丽丸都山城瓦当研究[J].东北史地,2008(2):67~74.
- [21] 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A].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员会.东北考古与历史[C].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85~88.
- [22] 本文所用好太王碑文采用方起东先生释文,见集安高句丽王陵[R].266~269.
- [23] 三国史记[M]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223:“九年(392)……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由于三国史记[M]所及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2年,实际上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1年,因此笔者倾向于东台子建筑为故国壤王八年(391)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遗迹.由于三国史记[M]在故国壤王纪年问题上多出一年,因此本文在引用与之相关年代时均做了调整.
- [27] 魏存成.高句丽遗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67.
- [28] 关于末王宝藏墓依据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卷一九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高丽传(5328):“高藏于永淳初卒,赠卫尉卿,诏送至京师,于颡利墓左赐以葬地,兼为树碑.”可知高藏陪葬今陕西西安唐太宗昭陵陵园内,具体位置目前仍不清楚.近年部分学者依据相关资料进行过一些研究,见拜根兴.追踪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冢墓所在——兼论高藏在唐生活[A].高句丽王陵研究[C].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8:379~388.
- [29] 关于“朱蒙墓”在桓仁地区的具体位置目前学界尚无确切说法,但基本都认为“朱蒙墓”位于桓仁境内.
- [30] 三国史记[M]卷第十九.高句丽本纪第七·安藏王.236:“三年(521)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五月,王至自卒本,所经州邑贫乏者,赐谷人一斛.”三国史记[M]卷第十九.高句丽本纪第七·平原王.239:“二年(560)春三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三月,王至自卒本,所经州郡狱囚,除二死皆原之.”三国史记[M]卷第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荣留王.251:“二年(619)……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五月,王至自卒本.”

Some Problems of The Qianqiu Tomb Taiwang Mausoleum and JiangJun Grave

WANG Fei-feng

Abstract: The Qianqiu Tomb (千秋墓) Taiwang Mausoleum (太王陵) and JiangJun Grave (将军坟) are Koguryo Guoneicheng Period's (国内城时期) 3 king's mausoleums, the masters of 3 mausoleums are Guguorangwang King(故国壤王) Haotai King(好太王) and Changshou King(长寿王). The Inscription Copper Bell Of Taiwang Mausoleum (太王陵铭文铜铃) is the year of Haotai King taking the throne made implements, it is not only the commemoration meaning, but also may the practical thing in Haotai King's lifetime (for example: horse gear), after Haotai King death it is the burial articles of Taiwang Mausoleum, in the madst of Inscriptions “大” word has

the phenomenon of clepsydraing “、” . Koguryo lotus tile-end has been born in period of the Haotai King, and in period of the Haotai King has a lot of patterns. JiangJun Grave is the built mausoleum that moving the capaital ago, because of moving the capatial to Pyongyang Changshou King is buried in Pyongyang, so JiangJun Grave is “xugong (虚宫)” .

Key words: Qianqiu Tomb Taiwang Mausoleum JiangJun Grave lotus tile-end

王 飞 峰, 男, 高丽大学韩国环境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wangfeifeng1981@163.com

手 机: 13581539534 (中国) 010-8628-9150 (韩国)